

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
中国少数民族教育研究创新基地
教育人类学研究中心

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 第四辑

主编 ◇ 滕星

社会变迁中山西乡土教材的 编纂与应用研究

温润芳 © 著

民族出版社

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中国少数民族教育研究创新基地三期重点建设项目
“乡土教材收藏与乡土知识传承研究” 项目编号：MUC98507-050201

香港乐施基金会资助项目“中国乡土教材收藏与研究”
项目资助号：CNG-94697-01-0709A-K

社会变迁中山西乡土教材的 编纂与应用研究

温润芳 ◎ 著

民族出版社

G423.3/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变迁中山西乡土教材的编纂与应用研究/温润芳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2013.4
(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滕星主编.第4辑)
ISBN 978-7-105-12689-7

I. ①社… II. ①温… III. ①乡土教材—研究—
山西省 IV. ①G42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56203号

策划编辑:虞农

责任编辑:向阳

封面设计:孟龙

出版发行: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北京市和平里北街14号

邮编:100013

网址:<http://www.e56.com.cn>

印刷:北京民族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销: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版次:2013年5月第1版 2013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字数:250千字

印张:9.125

定价:23.00元

ISBN 978-7-105-12689-7/G·1865(汉892)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文编辑一室电话:010-64271909

发行部电话:010-64224782

《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总序



人类学 (Anthropology) 是一门全面研究人及其文化的学科。它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人类群体的文化传承与文化学习、文化交流与文化发展。教育学作为专门研究如何培养人类下一代问题的一门学科,也肩负着传递知识、传播文化的基本功能。这样,人类学和教育学之间就有了天然的脐带,教育人类学也因此成为二者之间有机联系的一座桥梁。

教育人类学 (Educational Anthropology or Anthropology of Education) 是由教育学与人类学相互交叉并通过科际整合而形成的一门综合性边缘学科,其核心研究领域是多民族国家的少数群体教育,包括少数民族教育、乡村教育、移民教育、多元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内容。作为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教育人类学吸收了包括哲学、法学、人类学、教育学、心理学、生物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

国外教育人类学学科形成于 20 世纪中期,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形成了以欧洲德国、奥地利等国为代表的哲学教育人类学和以美国为代表的文化教育人类学两大流派。在文化教育人类学流派

中，又可以划分为主要由人类学家组成的教育人类学理论学派和教育学家组成的多元文化教育理论学派。

欧洲哲学教育人类学学派主要注重于从人的本质、教育的本质、人接受教育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出发，从哲学的高度研究教育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以美国为代表的文化教育人类学中的教育人类学理论学派，继承了英美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框架、概念与田野工作方法，并用其研究教育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多元文化教育理论学派则从英美文化人类学那里继承了“文化相对论”的观点，并将其与美国的土特产——美国社会民族理论相结合来研究教育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其最初目标是为了捍卫以少数民族为代表的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其长远目标是想通过教育改革构建一个不分族群、社会阶层、性别、年龄、身体与智力差异的、乌托邦式的国家与全球多元文化社会。文化教育人类学研究的范围主要包括少数民族教育（包括移民教育和土著教育等）和多元文化教育等方面。

教育人类学在国外已有长足的发展，其学科地位早已确立，并对许多国家的教育改革、教育政策、教育规划、教育咨询等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当人类进入 21 世纪后，随着国际上对全球一体化与民族文化多样性、文化差异与机会均等、多民族国家中主流民族与少数民族、国家一体化与文化多元化关系的讨论；随着知识经济社会的来临，人们对教育与社会弱势群体倍加关注，教育人类学也随之成为一门社会与学术界瞩目的重要的学术研究领域。

二

中国大陆地区的教育人类学研究起步较晚，肇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少数民族教育研究，当时研究的重点是异文化和跨文化教

育。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后,大陆才开始系统引介西方教育人类学的学科知识,传播教育人类学的基本思想和理论方法。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教育人类学获得了初步发展,不少学者开始尝试结合西方教育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本土的教育问题或试图建构本土教育人类学的理论体系,并对此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在 20 世纪 80—90 年代,大陆地区的教育人类学研究一直被冠以“少数民族教育研究”,简称“民族教育研究”,其学科则被称为“民族教育学”,鲜有称为“教育人类学研究”或“教育人类学”的,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这是由于人类学这门学科作为西方的舶来品,在 20 世纪初中期被引入中国时,产生的名称概念上的不统一,以及后来人类学在中国发展历史的影响。20 世纪初中期,人类学在英美分为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两大体系;在欧洲大陆的德国和苏联则将人类学称为民族学。当时的学界泰斗蔡元培先生赴德国进修民族学,并将民族学这一学科概念首先引入中国,尽管后来的人类学家吴文藻及其学生费孝通、林耀华等人先后将英美的人类学这一学科概念引入中国。但是,由于 20 世纪 50 年代初的大学院系调整、民族识别工作、少数民族研究,以及西方英美人类学被错划为“伪科学”,而苏联的民族学则占据着统治地位等历史的原因,使大陆地区人类学在很长一段时期只能以民族学替代文化人类学这一学科概念。当前,在西方人类学体系中,民族学基本上是作为文化人类学和体质人类学下的一门分支学科。而目前在中国的学科分类上,民族学被划分在法学门类下,而人类学则被划分在社会学门类下。同一门学科被人为地划分在截然不同的学科门类中,造成了人们在学科概念上的混淆。

其次,早期大陆地区的教育人类学研究主要以少数民族教育为其研究对象,很少以教育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扩大关注主体民族——汉族的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育,故一直以“少数民族教

育”、“民族教育”和“民族教育学”加以称谓。

再次，由于该学科领域的许多研究人员对国外教育人类学学科的历史与发展，以及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并不十分了解，导致他们对教育人类学与民族教育学学科彼此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十分清晰。当然，这是一个十分复杂并带有争论的学术问题，在此不拟展开讨论。

20多年来，中国大陆地区教育人类学发展取得的重要成果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是翻译引介了一批西方教育人类学的理论和著作，传播了教育人类学的基本思想和重要理念。

二是从理论上对这一学科进行深入探讨，试图结合国情研究大陆地区教育的发展问题或试图构建教育人类学的本土理论体系。

三是采用教育人类学的理论，关注异文化教育现象，提倡多元文化教育理念，寻求跨文化的了解和对话，特别是为研究民族问题和民族教育提供借鉴。

四是从人类学的视角切入，解读汉族的正规教育和非正规教育，探讨文化与教育的关系、教育的文化功能等，在一个更广阔的人文背景下探讨大陆地区的教育问题。

五是积极开展教育人类学的田野工作，出现了一批具有本土意义的教育人类学民族志作品。

六是在一些师范大学和民族院校陆续建立了相应的民族教育和多元文化教育教学科研机构，开设教育人类学课程，教育人类学人才培养模式逐步完善，学术科研队伍日益壮大。

七是在吸收西方教育人类学学科素养的基础上，进行本土理论建构，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些符合中国国情的教育人类学理论。

八是以教育人类学研究方法为基础的多学科合作研究课题成果初见端倪，积累了一定的教育人类学本土研究经验以及与国际组织合作开展研究的经验。

近年来，中国大陆地区教育人类学出现了注重学科建设，注重

在本土经验基础上探讨全球性议题，更加关注现实问题解决的新气象。目前，大陆地区教育人类学的学科建设已走完学科萌芽阶段，由非学术化阶段开始步入初步学术化阶段。

三

在新世纪，为了进一步发展中国教育人类学，2001—2002年，民族出版社推出了由本人主编的“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第一辑。这是中国教育人类学研究方面的第一套丛书。其第一辑的出版，标志着中国教育人类学学科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是一套开放性的学术丛书，它肩负着两个主要任务：一是系统介绍与评价国外教育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二是在批判性继承国外教育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积累与展示中国本土教育人类学的理论与个案研究的最新和重大研究成果。它提倡走出书斋，用文化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去研究当今中国的学校正规教育与社区、家庭的非正规教育。特别关注中国社会少数民族、妇女、残疾人和低社会阶层等弱势群体的教育问题。倡导书斋研究与田野调查相结合，即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风；推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自由与理论创新的精神。

“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第一辑共5部著作，分别为：《西部开发与教育发展博士论坛》（滕星、胡鞍钢主编，2001）、《20世纪中国少数民族与教育——理论、政策与实践》（滕星、王军主编，2002）、《族群、文化与教育》（滕星著，2002）、《文化传承与教育选择——中国少数民族高等教育的人类学透视》（王军著，2002）、《文化环境与双语教育——景颇族个案研究》（董艳著，2002）。这5本著作的出版，在学术界产生了良好的影响，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教育人类学的学科发展和中国西部民族地区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2005年,由本人担任主任的中央民族大学国家“985工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教育与边疆史地研究创新基地——“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研究中心”获准成立,这是国内“985工程”高校中首个以建设教育人类学学科为主要目标的研究机构。该中心力图在“985工程”的实施推动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体系和教育人类学学科体系。

在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研究中心的大力推动下,2008—2009年,民族出版社继续推出了由本人主编的“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第二辑共10部著作,分别为:《多元文化与现代性教育之关系之研究——教育人类学的视野与田野工作》(钱民辉著)、《教育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本土经验与学科建构》(滕星著)、《多民族文化背景下的教育研究》(滕星、张俊豪主编)、《多元文化教育——全球多元文化社会的政策与实践》(滕星编)、《教育的人类学视野——中国民族教育的田野个案研究》(滕星、张俊豪主编)、《多元文化社会的女童教育——中国少数民族女童教育导论》(滕星主编)、《教育与社会发展——中国贵州省的一个社区个案研究》(罗慧燕著)、《教育与族群认同——贵州石门坎苗族的个案研究(1900—1949)》(张慧真著)、《民族教育理论与政策研究》(滕星、王铁志主编)、《全球视野:教育领域中的族群性、种族与国民性》(西玛哈恰等主编,滕星、马效义等译)。这些著作中既有教育人类学基本理论和方法的探讨,也有深入细致的田野个案研究,较为集中地体现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教育人类学的研究水平以及国外相关研究的进展。

2005—2009年,在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的支持下,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研究中心(现为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中国少数民族教育研究创新基地)实施了五个重点建设项目,分别为:

(一)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类型与初中地方性校本

课程建构（滕星教授主持）；

（二）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乡土教材开发的教育人类学田野调查与基础理论研究（滕星教授主持）；

（三）中国少数民族新创文字在教育教学中的应用状况及存在问题调查研究（滕星教授和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王远新教授联合主持）；

（四）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基础教育政策、法规与管理体制研究（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劳凯声主持）；

（五）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与效益研究（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研究所王蓉教授主持）。

在这五个项目建设的直接推动下，我们精心挑选了一批优秀的研究成果作为《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第三辑出版，这些作品分别是：

《经济文化类型与校本课程建构》（滕星、巴战龙、欧群慧等著）、《中国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体制变革与义务教育发展：社会学透视——从税费改革到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郭建如著）、《西部民族贫困地区农村义务教育财政、资源配置与效益研究——基于云南、新疆、内蒙古等地贫困县的案例研究》（郭建如著）、《中国少数民族新创文字应用研究——在学校教育和扫盲教育中使用情况的调查》（滕星、王远新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新创文字研究论文选集》（滕星、王远新、海路主编）、《在田野中成长——教育人类学田野日志》（滕星主编）、《新创文字在文化变迁中的功能与意义阐释——以哈尼、傈僳和纳西族为例》（马效义著）、《土族、羌族语言及新创文字使用发展研究》（宝乐日著）、《多元文化整合教育视野中的维汉双语教育研究——新疆和田中小学双语教育的历史、现状与未来》（艾力·伊明著）、《民族学校教育中的文化适应研究——贵州石门坎苗族百年学校教育人类学个案考察》（张霜著）、《社会变迁中的壮文教育发展》（张苗苗著）、

《中国乡土教材的百年嬗变及其文化功能考察》(李素梅著)、《学校教育·地方知识·现代性——一项家乡人类学研究》(巴战龙著)、《人类学视野中的教育研究》(滕星、海路主编)、《书斋与田野——滕星教育人类学访谈录》(滕星等著)、《多元文化视野中的民族院校》(张俊豪著)、《中国乡土教材应用调查研究》(滕星主编)、《无根的社区 悬置的学校——湖南大金村教育人类学考察》(李红婷著)、《文化变迁中的文化再制与教育选择——西双版纳傣族和尚生的个案研究》(罗吉华著)、《云南省孟波镇中学多元文化教师民族志研究》(欧群慧著)。

在完成“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第三辑的编辑出版工作之后,在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中国少数民族教育研究创新基地教育人类学研究中心的支持下,从2012年夏开始,“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第四辑(第一批)8部著作将陆续与读者见面,分别是:《乡土知识与文化传承——中国乡土知识传承与校本课程开发研讨会论文集》(滕星主编)、《国家意识与地域文化:文化变迁中的河南乡土教材研究》(班红娟著)、《民族地区发展与乡土教材开发——宁夏回族社区教育人类学田野调查》(张爱琴著)、《甘南藏汉双语教育历史与发展研究》(王洪玉著)、《拉祜族女童的教育选择——一项教育人类学的回访与再研究》(杨红著)、《台湾乡土教育历史与模式研究》(吴杰著)、《社会变迁中山西乡土教材的编纂与应用研究》(温润芳著)、《广西民族地区语文德育研究》(韦美日著)。

我们相信,《教育人类学研究》系列丛书的出版,将在教育学与人类学学科之间搭起一座桥梁,它必将进一步推动人类学与教育学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与整合,为教育学和人类学开辟出一块新的学术研究领域,从而为中国的教育改革作出贡献。

滕星

2012年5月修订于中央民族大学独树斋

目 录

导 论	(1)
一、研究缘由	(1)
二、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4)
三、文献综述	(9)
四、基本概念界定	(24)
五、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	(28)
六、研究的重点、难点、创新点	(36)
七、研究计划及文本结构	(38)
 第一章 山西的区域概况与文化基础	(41)
第一节 山西的地理概貌	(41)
一、山西的自然环境	(41)
二、山西的人文地理	(43)
第二节 山西的文化基础	(50)
一、山西的历史沿革	(50)
二、晋文化概述	(52)

第二章 山西乡土教材编纂与应用的历史轨迹（上）	(55)
第一节 清末山西乡土教材的产生	(56)
一、清末山西乡土教材产生的背景	(56)
二、《乡土志例目》的颁布与清末山西乡土志的编纂 ..	(61)
三、清末山西乡土志的文本分析	(68)
第二节 中华民国时期山西乡土教材的演变	(77)
一、探索阶段（1912—1926 年）	(79)
二、规范阶段（1927—1936 年）	(96)
三、多元阶段（1937—1949 年）	(116)
第三章 山西乡土教材编纂与应用的历史轨迹（下）	(121)
第一节 探索和调整阶段（1949—1965 年）	(122)
一、1949—1965 年山西扫盲教材评介	(122)
二、1949—1965 年山西乡土教材评介	(135)
第二节 激进与扭曲阶段（1966—1976 年）	(139)
一、“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小学教材政策	(139)
二、“文化大革命”时期山西乡土教材的文本分析	(140)
第三节 恢复与改革阶段（1977—2000 年）	(147)
一、改革开放以来山西乡土教材编纂与应用的背景 分析	(147)
二、1977—2000 年山西乡土教材评介	(151)
第四章 对 21 世纪以来山西乡土教材编纂与应用的实地 考察	(158)
第一节 概念辨析：地方教材、校本教材与乡土教材 ..	(159)
一、概念辨析：地方课程与地方教材	(160)

二、概念辨析：校本课程与校本教材	(162)
三、地方教材、校本教材与乡土教材的联系与区别 ...	(164)
第二节 新课程改革背景下山西乡土教材编纂与应用	
审视	(166)
一、山西省教育厅对于开发地方课程的规划	(166)
二、新课程改革背景下山西地方教材评介	(167)
三、新课程改革背景下山西校本教材评介	(186)
第三节 新课程改革背景下山西乡土教材编纂与应用	
反思	(202)
一、乡土教材的发展特点	(202)
二、乡土教材在应用中面临的困境	(204)
第五章 关于乡土教材的理论思考	(206)
第一节 对乡土教材若干问题的思考	(206)
一、乡土教材概念的界定	(206)
二、对百年来山西乡土教材编纂与应用情况的总结 ...	(208)
三、乡土教材边缘化现象探讨	(219)
第二节 乡土教材应用中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	(230)
一、乡土教材与国民教育	(230)
二、乡土教材的教学方法	(233)
第三节 乡土教材的发展趋势	(236)
一、编纂乡土教材应遵循的几条原则	(237)
二、乡土教育师资的培养	(241)
结 语	(248)
一、研究的内容与结论	(248)

二、对本研究的反思	(250)
附 录	(253)
附录一 1906—2010 年山西乡土教材汇总表	(253)
附录二 访谈提纲	(257)
附录三 教师问卷	(260)
附录四 学生问卷	(264)
参考文献	(268)
后 记	(278)

导 论

一、研究缘由

2008年9月，笔者进入中央民族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并有幸参与导师滕星教授主持的课题“中国乡土教材收藏与研究”。正是在参与课题研究的过程中，笔者对于中国乡土教材的编纂与应用有了新的认识，了解到中国乡土教材已经有百余年的发展历史，在不同历史时期全国各地编纂过多种多样的乡土教材，并走进了乡土教材的研究领域。

中国在20世纪的百年的历史中曾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沧桑巨变，从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覆灭到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社会的各个领域诸如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都在发生着种种变革，似乎变革成为近百年来中国的时代主题。反观历史，教育领域的变革也是史无前例的，废科举和兴学堂是清末新政中教育改革的两大工程。晚清政府在1901年首先宣布废除八股文的考试程式，1905年又颁布废除科举令。1903年由张之洞、张百熙、荣庆等修订的学堂章程上奏光绪皇帝，得到批准并在全国推行，这个章程即《奏定学堂章程》，其中确立的学制即癸卯学制。这标志着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一千余年的科举制度被顺利废除，具有近代色彩

的全国性学制体系——癸卯学制被制定和颁行。教育制度的这一巨变也意味着中央集权式的社会结构有所松动，正如一位国外学者所说的：“科举制度曾经是联系中国传统的社会动力和政治动力的纽带，是维持儒家学说在中国正统地位的有效手段，是攫取特权和向上爬的阶梯，它构成了中国社会思想的模式，由于它被废除，这个社会丧失了它特有的制度体系。”^①

在清末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在晚清政府迫于种种压力所实施的教育改革中，实施乡土教育被提上日程。“癸卯学制以日本学制为蓝本，并结合中国具体情况加以改造而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基本精神。这个学制通过谕旨颁行全国以后，便成为各省兴学的范本，甚至民国学制也是在此基础上逐渐改进而成的。”^②在癸卯学制中对初等教育阶段实施乡土教育提出了明确规定。清政府还于1905年颁布了《乡土志例目》，作为各地推广乡土教育、编纂乡土教材的指导性规范。虽然，包括乡土教育在内的教育改革归根结底是为了巩固晚清政府的统治，但由于乡土教育所倡导的理念和乡土教材所包含的内容具有进步色彩，而且清末新政在客观上为乡土教材的编纂以及乡土教育的实施提供了制度支撑和发展空间，因此全国各地编纂出了一批乡土教材，乡土教育在各地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

乡土教材在清末新政中应运而生，历经百余年的社会变迁，在不同历史时期涌现出了不同版本的乡土教材，并始终在教育领域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从中华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许多学者都对乡土教材和乡土教育展开了相关的研究，全国各地都编纂了各自的乡土教材，还将乡土教材应用于学校教育，所有这些都为乡土教材编

① [美] 吉尔伯特·罗兹曼著，陶驿译：《中国现代化》，33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② 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125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